



2025年5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海卉 视觉设计:董昌秋 检校:高 峰 史凤斌

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05



沈阳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宁先圣

“书的分量,其实也是人的分量。”这句话出自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梁衡的《把栏杆拍遍》,书中梁衡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比喻为其搭

乘“历史之舟”的“船票”,而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今天也交上一枚小小的“船票”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把人们的生活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境界”吾亦追求,有如真理与光明。提起审美,不得不提到“德国最伟大的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席勒的思想,影响了历代的中国学者,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话:“精神的这种高度的宁静和自由,与力量和朝气相结合,这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使我们超脱所处的心境,这也是真正审美品质的最可靠的试金石。”

逐美不易,顿挫离愁。文字会带给人持久而广阔的震撼力量,击碎郁结,虽身处喧嚣城市,无法登临况味,可内心能在书稿中跃过山巅,岂不快哉?读梁漱溟的

《人生三路向》能不断扩容内心之能量,放大人生之坐标。当我们对生活报之以歌,心境将随之辽阔。阅读,就这样,助我成为更为宏观、平和、包容的人。

欲隐欲现,愈淡愈浓。读过《沈从文的自传》才发现,简单而平白的情绪表达原来才是对生活的激情与爱。我最喜欢沈老的一篇文章是《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笔触细腻,仿佛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生活,不放过生活中任何一处细微的荡漾。他说,“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生而知之,艺术家的触感都是极致发达的,是天赋,也是命运。他是真的喜爱那些平常的生活,内心一定对生命、对人民、对故土充满了敬畏吧?美学体系也因此构建。轻而不柔,细而不腻,没有矫揉造作,朴实而谦卑,是沈从文善良平和的内心,很少有散文有这种味道。

读沈从文,还要读颜家文的《我见到

的沈从文》,书中《美丽与苍凉——沈从文的九妹和他的儿子》这篇文章讲述了沈从文的九妹的故事,当小人物的命运裹挟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洪流中,历史瞬间变得具象起来。沧海一粟,回归“生命为何而来”的原始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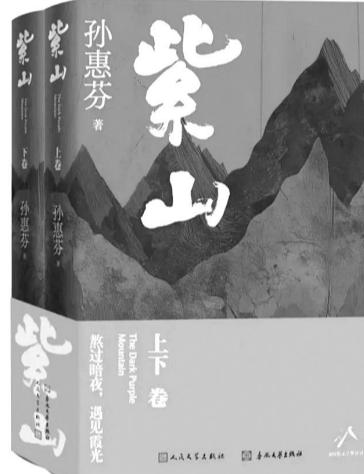
拭过岁月的痕迹,翻开历史的卷轴,穿梭在近代中国的弥漫硝烟里。我又读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兵工地图》《西南联大的遗产》《我的前半生》《角落里的民国》。读史书如来路,将自己放置在宇宙的坐标系里,将过往的时空拉置。我作为一名教师,其时代责任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观照心灵,在文字背后更是要传承民族文脉、塑造民族品格。文字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

阅读的内驱力一定是我们对知识、真理的渴求。“君子不器”,我告诉自己,摒弃功利主义思维,学以致知,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制图 董昌秋)

## 人性之光照亮沉睡的紫山

洪树



《紫山》的故事始于上世纪90年代辽宁山区的小峪沟村。孙惠芬将叙事置于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冷小环作为外来者,象征着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入侵;汤犁夫曾是乡村的“道德楷模”,却在伦理崩塌中沦为“罪人”。两人的关系不仅是情感纠葛,更是城乡价值观碰撞的缩影。小说通过三人三天的极限时空,解剖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精神阵痛;传统伦理的瓦解、人际信任的断裂,以及个体在道德夹缝中的挣扎。

救赎的线索则隐藏在人物的自我觉醒中。冷小环被神秘人救走,汤犁夫最终选择“搬离沟里”。这一行动不仅是地理迁徙,更是精神突围——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重构生活意义。作家暗示救赎并非抵达完美结局,而是在破碎中重新扎根。

孙惠芬此前的作品如《歇马山庄》《生死十日谈》多以线性时间铺陈乡土变迁,而《紫山》在结构上实现了突破,从线性叙事到时空折叠。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三天浓缩三人关系的爆炸性冲突,采用慢速的心理描写与细节堆叠;下卷以三十年跨度展现汤

犁夫与冷小环的“后灾难人生”,叙事节奏陡然加快,穿插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宏观背景。这种“三天与三十年”的张力,既模仿了悲剧的古典结构,又赋予文本现代性的时空层次感。

语言风格上,孙惠芬进一步融合地域性与全面性。辽宁方言如“沟里”“抬杠”与乡村风俗如葬礼、祭山的细腻还原,强化了叙事的在地性;而人物内心独白的哲学化倾向如“每个人都是作茧的蚕”,则使故事超越地域局限,直指人类共有的精神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不可靠叙事”的运用。例如汤立生之死的真相始终模糊,村民的流言与当事人的沉默形成对照。这种留白并非回避道德判断,而是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构建——罪恶与救赎的边界,最终取决于读者的视角。

阅读《紫山》的体验如同置身一场暴雨,感受窒息感与喘息感的交替。上卷的密闭空间叙事带来强烈的窒息感:三人共处一室的每一秒都被拉长,屋外的雨声、村民的私语、垂死者的喘息交织成压迫性的声场。孙惠芬擅用感官描写强化这种紧张。下卷则如暴

说避免陷入“苦难奇观”的窠臼。读者既感受到命运的沉重,也在人物缓慢的觉醒中获得喘息——正如紫山在雾气散去的瞬间显现,黑暗中的微光反而更显珍贵。

《紫山》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乡村文学的一次转向,价值在于乡村叙事的范式突破。以往乡土写作多聚焦于物质贫困或田园牧歌,而孙惠芬将笔触深入精神层面,揭示城镇化不仅是地理迁移,更是价值观的重构。小说中,乡村不再是怀旧的对象,而是道德博弈的战场;城市亦非救赎的应许之地,而是欲望与异化的新城。《紫山》提供的答案并非简单的折返,而是“精神的返乡”。

《紫山》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为乡村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变迁留下一份标本。孙惠芬没有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将伤口撕开,让读者看到血肉模糊的真相。这种写作伦理,使小说超越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所有“精神漂泊者”的镜像。《紫山》试图告诉读者:真正的救赎,始于承认生活的破碎,并在裂缝中播种希望。正如紫山的雾气终会散尽,人性的微光永不熄灭。

## 气候科学中那些悬而未决的迷思

江晓原

如今许多人已经对“全球变暖”这一说法习以为常,似乎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据大众媒体上普遍的说法,这个事实是由气候科学家告诉我们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依据,是有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如不放弃关于“客观气候科学”的幻想,许多矛盾就无法解释,许多事情就看不懂。

### 气候科学研究的数据从何而来?

要理解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不确定性,有两条主要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关注作为论断依据的数据来源。

要讨论地球是不是在变暖,当然首先要获得历史上地球的温度数据。但是现代的专业气候温度记录,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而要论证“全球变暖”理论,必须以千年的时间尺度来考察,这才能够证明地球温度在最近数十年中急剧上升,那么在1850年之前的地球温度,我们从何得知?

没有专业数据,就只能依靠间接推测。推测古代地球温度有如下途径:历史文献记录(非专业的),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珊瑚沉积、深海岩芯、孢粉、古土壤、沉积岩等,但是相对来说最可靠的途径是——冰芯。

冰芯是现代人能够使用的最重要的古气候研究手段。从理论上说,所有在大气中循环的物质,都会随着大气环流而到达冰川上空,并沉积在冰雪表面,最终形成冰芯记录。冰芯中有大量历史信息,比如测定冰芯中各冰层的氧-16和氧-18的比值变化可以确定冰层年代,测定冰芯中氢、氧同位素的比值可以度量当时的气温。

尽管比起其他各种间接推测地球历史气温的途径来,冰芯信息量大、保真性好、分辨率高,记录序列可长达数十年,因而备受青睐。但我们可以从常识就可知,冰芯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绝大部分都是间接的、不精确的,分析处理起来仍有巨大的争议空间。

至于其他各种途径,就更不可靠了。例如通常被视为仅次于冰芯的树木年轮,用来推测地球温度就有更大的争议空间。首先选择不同的树种就可以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同时对不同的树种赋予不同的统计学权重,也很容易构造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历史气温曲线。

尽管由于缺乏1850年以前地球温度的确切记录,我们只能借助于冰芯、树木年轮等途径间接推测,因此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全球变暖”理论,其实都无法建立在一个理想的坚实基础之上。但退而求其次,间接途径总比没有途径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冰芯中的历史信息能够支持“全球变暖”理论吗?

丹斯加德和奥斯卡1984年发表了《格陵兰岛深层冰芯揭示的北大西洋气候振荡变化》,这被认为是利用冰芯研究历史气候变化的重要文献。他们认为百万年以来,存在着一个主宰着地球气候变化的“1500年周期”,使地球气候处于几乎恒定的周期波动中。

通俗的理解就是:地球温度有自身的变化周期,在这种周期面前,人类的工业碳排放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不能说明地球近年来的温度变化,1940年后工业碳排放量激增,但地球温度却在下降。事实上,直到1975年,主导当时气候变化研究的主题还是“全球变冷”。

此外“全球变暖”理论的许多论点也都面临争议。比如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被视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但反对派认为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被颠倒了——实际上是气温升高导致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

### 气候科学的研究的结论如何到达公众面前?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迷思》一书为理解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第二条路径。本书作者史蒂芬·库宁通过对气候科学和“全球

变暖”理论中若干重要具体论断的系统考察,深入浅出地向读者展示了当今气候科学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者也可以说,本书就是对于“为何至今尚无客观的气候科学”的具体论证。

作者在本书“导言”中就明确表示:“由于相关的气候数据不足,我们很难分辨哪些气候变化是来自人类影响,哪些是未被充分理解的自然变化……简单来说,仅凭我们目前掌握的气候科学知识,尚不足以对地球气候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变化作出有价值的预测,更不要说借此判断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了。”

“全球变暖”理论的另一个“利器”是在计算机上搞的模型,用这些模型来“预言”气候变化将会造成怎样的全球灾难。但在本书作者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家眼里,这些模型很多都是不靠谱的,尽管作者只是很含蓄地表示:“我们的模型越来越精致,但它们对未来的描述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作者还引用了这方面权威专家的一句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其中有一些有用。”

这本书是学者严谨的判断,作者还对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逐一给出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这方面的情形颇有帮助。

### 论战双方的公信力记录

对于论战双方学术公信力的记录优劣,应该成为判断“全球变暖”问题时的另一个思考维度。

对于“全球变暖”理论的坚信者来说,不幸的是,主张“全球变暖”的阵营在学术公信力方面有非常著名的不良记录,这就是“曲棍球杆曲线”造假事件。

为使全球变暖被广大公众接受为一个“科学事实”,迄今为止主要是两方面的努力:首先是诉诸感官印象,主要是展示、报道全球各地气温升高的新闻、画面、视频等等,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但仅仅展示这些并不能否定“地球气温本来就有周期

变化”的质疑,所以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这些证据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是一条名为“曲棍球杆”的著名曲线,戈尔的纪录片中也强调过同样的曲线——描述过去一千年地球的气温变化情况,曲线基本呈水平状,只是时间轴右端的最近几十年明显翘起,状如曲棍球杆。

这条曲线是曼恩在1998年和1999年的两篇论文中公布的,前一篇文章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曼恩的文章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高度重视,很快广泛传播,被数以千计的报告和出版物引用,也被克林顿政府当作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曼恩本人也随之平步青云,被任命为IPCC有关气候报告的执笔人。

但是这条曲线不久就被两位加拿大学者指控学术造假。例如,曼恩选择北美西海岸山区的驯鹿年轮来描述历史上的气候温度,并赋予它在统计学上站不住脚的权重,使得构造出来的地球历史气温曲线符合自己的需要。这一指控相当严厉。

2004年曼恩不得不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份“更正错误”的声明,不过他辩解说,这些错误“没有影响我们以前公布的结果”。但这项指控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委托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与理论统计学委员会主席威格曼教授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2006年威格曼提交了调查报告,结论为:曼恩的研究方法错误,他论文中的分析无法支持他的结论。

至此“曲棍球杆曲线”变成学术丑闻。相比之下,反对“全球变暖”阵营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样的学术丑闻。即使我们选择相信“全球变暖”,主张保护环境,毕竟也不能依靠学术造假来支撑理论。

近年的全球变暖,很可能只是因为现在正处于地球固有的某个温度波动周期的变暖阶段而已。实际上,要肯定“全球变暖”或否定“全球变暖”,双方都没有足够的确切依据。因此各国政府只能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决定实际政策,并选择对“全球变暖”理论的官方态度——只要在事实上对自己国家有利就行。



## 书海一勺,气象万千

李海卉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福尔摩斯侦探案》印数达845万册,而中华书局出版的《蔡元培年谱》只印了5000本。邹韬奋编《生活》周刊时,以“有趣味有价值”为号召,但是趣味价值,到底怎样解释呢?《陶庵回忆录》里写道:“《生活》之能从一两千份畅销到十多万份,原因所在,我看是内容的合乎情理,每期刊登的文章,从韬奋的《小言论》到《信箱》,论的说的,都不是什么奇文,但是老少咸宜俗共赏。”

进而陶亢德提出:“一个刊物要编得好,编者必领心里有个主意,若只想迎合读者,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人心不一,张三爱看这样,李四好读那样,你有天大本领,能够尽如人意?倒是我有我的主意,我写和我选我以为好的文章正好。”

出版人的案头,总有一盏不灭的灯。灯下是堆叠的稿纸、勾画的笔迹,以及作者与编辑之间密密麻麻的通信。他们以书为舟,在时代的浪潮中摆渡思想;以笔为锚,为文化留下一个个沉甸甸的坐标。李昕在《一生一事》中反复提及一个词:“训练有素”。初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他从校对做起,每天审阅5万字书稿,一字一句打磨《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的巨稿。他校杨绛译《堂吉诃德》时,发现“风车”一词在西班牙原文中实为“磨坊”,立即标注。杨绛回信:“译稿仓促,多谢指正。”这份译稿后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面对新人杨义的150万字书稿,李昕顶住压力将其推为高校教材,只因“扎实厚重,新意迭出”的学术价值值得冒险。

汪家明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匠人精神,他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时,策划《老照片》系列,提出“以图叙史”的模式,要求每张图配千字短文,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他用图与文的交织打破传统出版模式,从封面到版式,甚至书脊的麻线铰接,皆追求“展卷之乐”,让历史以更鲜活的面目走进大众视野。在编辑《老照片》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附着一张泛黄的照片:1938年,云南腾冲一位私塾先生带着十余名学生站在茅屋前,背后挂着“礼义廉耻”木匾。照片提供者称,这是其祖父冒死保存的家族遗物。这张照片后被编入《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专题,成为抗战时民间教育的实证。汪家明说:“编这些书,一定会比生命更长更久。”

李昕退休前最后经手的书是《商务印书馆百年书信选》。书中收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张元济致胡适的信:“总厂全毁,唯有纸型幸免,此乃文化命脉所系。”这批纸型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复兴的基础。

汪家明在范用临终前探望,见他正在病床上校对《叶雨书衣》。范用颤抖着在稿纸边缘写下一行小字:“目录页留白多,可加衬页。”这本书后来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后来汪家明整理范用遗物时,发现一本1953年工作笔记。某页记录:“巴金《家》再版意见:觉慧离家时‘头也不回’可改‘回头望了一眼’环,更合人性。巴金未采纳。”这条未被采纳的建议,成了编辑与作者博弈的永恒注脚。

“写,本身就是一种史观。”书海一勺,或许微不足道,但万千气象,正藏在这一勺之间。出版人的价值,藏在那些被抢救的画页、被较劲的纸型里。李昕40年校对过5亿字,汪家明编过230期《老照片》。这本书后来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后来汪家明整理范用遗物时,发现一本1953年工作笔记。某页记录:“巴金《家》再版意见:觉慧离家时‘头也不回’可改‘回头望了一眼’环,更合人性。巴金未采纳。”这条未被采纳的建议,成了编辑与作者博弈的永恒注脚。

“写,本身就是一种史观。”书海一勺,或许微不足道,但万千气象,正藏在这一勺之间。出版人的价值,藏在那些被抢救的画页、被较劲的纸型里。李昕40年校对过5亿字,汪家明编过230期《老照片》。这本书后来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后来汪家明整理范用遗物时,发现一本1953年工作笔记。某页记录:“巴金《家》再版意见:觉慧离家时‘头也不回’可改‘回头望了一眼’环,更合人性。巴金未采纳。”这条未被采纳的建议,成了编辑与作者博弈的永恒注脚。

“写,本身就是一种史观。”书海一勺,或许微不足道,但万千气象,正藏在这一勺之间。出版人的价值,藏在那些被抢救的画页、被较劲的纸型里。李昕40年校对过5亿字,汪家明编过230期《老照片》。这本书后来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后来汪家明整理范用遗物时,发现一本1953年工作笔记。某页记录:“巴金《家》再版意见:觉慧离家时‘头也不回’可改‘回头望了一眼’环,更合人性。巴金未采纳。”这条未被采纳的建议,成了编辑与作者博弈的永恒注脚。

### 荐书

#### 文本深处的馈赠



《雪隐鹭鸶》  
译林出版社

作家格非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背景中考察、剖析日常器物、白银货币、法律伦理、市民文化等议题。全书共分三卷。卷一“经济与法律”和卷二“思想与道德”在联系现代社会和思想史脉络背景下详细考察;卷三“修辞例话”赏析其修辞的精彩之处,探寻深邃幽微的人情世态和历史文化信息。



《月光与篝火》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意大利作家切萨雷